


# 敦煌文物 流散记

刘进宝 编著

DUNHUANG WENWU  
LIUSANJI

震惊世界的发现  
千载之谜谁解说  
斯坦因敦煌劫宝记  
“汉学大师”取精华  
博物馆里的精魂何处  
不甘落后的美轮美奂  
带兵厄运的华尔纳  
胡尔斯坦文道赫  
敦煌文物流散的原因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文物流散记 / 刘进宝编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22. 11

ISBN 978-7-226-05771-1

I. ①敦… II. ①刘… III. ①敦煌学—研究 IV. ①K87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54864号

责任编辑: 李青立

装帧设计: 雷们起

敦煌文物流散记

刘进宝 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插页3 印张8 字数180千

2022年11月第1版 202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226-05771-1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写在前面的话

1840年，英国用大炮敲开了中国的门户，随后各国列强蜂拥而至，在强占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还纷纷派人来寻宝探险，从而使中国的文化遗产也进入了一个大量外流的灾难期。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既毁坏了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也毁了文源阁的《四库全书》，劫走了残余的部分《永乐大典》和园中的珍宝。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掠走了清宫廷中珍藏的书画等珍贵的艺术品。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强盗式的抢劫外，一些国家的探险家、考察家还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盗劫了不计其数的中国珍贵文物和艺术品。

据统计，1856—1932年间，俄、英、德、瑞典、法、日、美诸国考察队等曾来我国西北地区考察、探险66次，每次考察都会多少不等地盗劫、骗购一些中国的古迹文物。在各国的考察、探险中，以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俄



国人奥登堡和美国人华尔纳对敦煌遗书、文物的盗劫、破坏最为严重，给中国古代文化造成的损失也最大。因此，我们就以这些考察、探险对敦煌遗书、文物的盗劫、破坏为案例，通过对这只“麻雀”的解剖，来探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背景及具体情况。

敦煌文物的发现，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不幸的是，敦煌文物发现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之际，许多文物被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学者”“考察团”劫去，部分为国内官僚地主及私人收藏，造成了我国文化事业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早在 1930 年，爱国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沉痛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sup>①</sup>

敦煌文物外流，是中国文物外流的一个缩影。当然，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敦煌文物是整个丝路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分析、研究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在某些部分的探讨中，可能会涉及敦煌以外的一些地区。

但愿通过我们的叙述，使读者能够明了敦煌遗书的发现，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及时间，丝路文物被盗的历史背景，各国组织考察团的背景、条件，各国考察团对敦煌文物的劫夺破坏，各国的收藏及研究情况等等，进而对敦煌学和丝路文化有所了解。

<sup>①</sup>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节：震惊世界的大发现	001
一、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001
二、土地庙文书发现记	009
第二节：千载之谜谁解说	
——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	018
一、藏经洞原为洪誓（音辩）影窟	018
二、藏经洞封闭之谜	024
第三节：斯坦因敦煌劫宝藏	038
一、斯坦因及其第一次考察	039
二、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与千佛洞骗宝	059
三、斯坦因的收获与英藏敦煌文书	080
第四节：“汉学大师”取精华	090
一、法国的“汉学”研究	090
二、伯希和敦煌劫宝藏	095
三、精华犹在巴黎藏	112
第五节：姗姗来迟的橘瑞超	120
一、大谷光瑞考察团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外流	120
二、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书	140



第六节：不甘落后的奥登堡	161
一、组织考察的“俄国委员会”	161
二、奥登堡与敦煌盗宝	166
三、俄国的敦煌文书	175
第七节：带来厄运的华尔纳	185
一、第一次盗劫	186
二、第二次考察与哈佛燕京学社	195
三、损失惨重难挽回	204
第八节：劫余断片又遭劫	212
一、早期的流散	213
二、运京途中遭劫记	214
第九节：敦煌文物流散的原因	222
一、总体背景的探讨	223
二、具体原因的分析	229
附录一：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所订合作办法原文	239
附录二：《古物保存法》	244
结束语	247
后 记	249

## 第一节：震惊世界的大发现

我国的历史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非常丰富，经过漫长岁月和历史的沉淀，有些因各种原因已失佚不传，有些仍遗存于地下或洞窟山岩。可能有一天，它们将被发现而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一部分。

在古代，曾有两次文物典籍的发现，即汉代的孔壁古文和晋代的汲冢竹书，都与历史文化有密切的关系。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我国的文化典籍，又有几次大的发现，即河南安阳殷墟甲骨、西陲汉晋简册、明清两代的内阁大库档案、敦煌千佛洞遗书。这些文化典籍的发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其中敦煌遗书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与研究热潮，并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 一、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距今才一百余年。但由于现存记载互



相矛盾，更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其发现时间及过程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据王道士墓志——《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记载，藏经洞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899年。王道士墓志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赵玉明、方至福为其师、师爷道士王园禄（即王园箒）去世百日而立。墓志嵌于莫高窟对岸王园禄墓塔上，为木质阴刻，面南，高174厘米，宽75厘米。碑首中央篆刻“功垂百世”四字，其两旁各刻一龙。墓志全文如下<sup>①</sup>：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箒，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练。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

<sup>①</sup> 录文经李永宁先生整理，载《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焉壮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轮虽渺，道范长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子：赵明玉

千佛洞太清宫徒

稽首谨志

孙：方至福

《墓志》所说的太清宫，俗称下寺，与藏经洞所在的 16 号窟，近在咫尺，东西毗邻，原为王道士的法堂及居室。

立《墓志》者乃王道士的徒子徒孙，所立时间距藏经洞的发现已有 30 年之久。《墓志》中所述情节与实际情况又不完全相符，内有虚构、浮夸之词。如将王圆禄<sup>①</sup>的“禄”写为“篆”就是错误的，王道士生前于 1906 年所立《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和 1910 年左右其亲书的《催募经款草册》都是“禄”，其徒子徒孙所写《墓志》，以为王圆禄是道士，就应该是这个“篆”，显然是想当然的改写，而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此说虽有根据，但未必准确，学术界鲜有附会其说者。

另一说发现于光绪二十六年，是年为庚子年，即公元 1900 年，此说目前为学术界所公认。庚子发现说，最早见于叶昌炽的《缘督

<sup>①</sup> 在本书中使用“王圆禄”，此后不再一一标注。



王道士墓志



庐日记》。《日记》中说，甲辰年（1904年）“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鐍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sup>①</sup>。

叶氏记此事之年，距发现藏经洞只有四年，比较可信。

1900年发现说也见于《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此碑为木质阴刻，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碑嵌于三层楼下层洞窟，今编16号窟甬道南壁。碑高230厘米，宽89厘米。《功德碑记》全文如下<sup>②</sup>：

三危为敦煌望山，其西麓有千佛洞。稽诸志乘，即古雷音寺，未详创始何代。梵宇立唐时残碑尚云再修。历年邈远，迄今无考。但倚幽崖深谷间，疏岩凿石，缔造佛像万计。或装塑宝座，或绘画悬壁，色相庄严，灿然妙善，足征西域当年修佛之盛也。后经兵燹蹂躏，佛像屡遭毁废，龕亦沙压倾圮，梯级多断，攀缘莫逮。千百载而下，追溯古迹，每足动人感慨之思。然兴者不废，废者复兴，尤存乎其人而已。丁酉之岁，邑从九戴君奉钰倡首续修，聚众善之财力，营艰大之工程，左提右挈，其运意为独挚矣！始构大雄之殿，继兴大士之宫，畴昔荒刹萧索，不蔽风雨，今则洞宇峥嵘、观瞻辄资景仰。苟非竭诚补葺，即阅五六年，殊难告厥厥功。而鄂省羽流圆禄，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睹迤北佛洞寂寥，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影印本第7册第460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 录文经李永宁先生整理，刊于《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银座，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门洪暨立。参考正史，建中二年沙州沦陷吐蕃后，逾七十年，刺史张公义潮（议潮）正于大中五年以瓜沙等十一州收复归唐。遂改沙州为归义军，以义潮作节度使。由大中而至于今，且千有余岁，是园禄孤志劈画，吾乡人众创见千岁遗蕴之物，亦甚异。园禄测度藏经佛龛，结造三层楼，仍属戴君奉钰提倡而振作之，庙貌焕乎维新。功既竣，请余援笔而付剞劂。谨略述其梗概。若夫润色鸿业可大可久，更于继起有厚望焉！是为记。

敕授文林郎、候铨试用知县、丁酉科选拔联捷举人郭璘谨撰并书。

例授登仕佐郎、吏部候选巡政厅、从九品、经理社首戴奉钰督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即选儒学训导、岁贡生、社首习登瀛监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候选儒学训导、附贡生、社首马育江监修。

经理社首戴号公 陈正言 杨春洲 殷善言 戴化勋 胡从义

住持 王园禄

徒：王明发 赵明裕 仝修。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岁次柔兆敦牂孟夏之月上浣穀旦 立

此碑所记“庚子孟夏”发现说，有可能源于王道士之口，因为



王道士曾亲自参与三层楼修建之事，所以其说比较可信。

1900年发现说，还见于王道士的《催募经款草册》(又名《王道士荐疏》)。此件为玫红纸墨书，现存敦煌研究院。《草册》<sup>①</sup>说：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园禄敬叩

伏俯叩恳

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

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



《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sup>①</sup>《草册》原文见于青《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册》，载《西北日报》1945年5月22日。照片图片和录文参阅梁旭澍《〈敦煌县正堂申谕〉〈催募经款草册〉录文及相关问题》，载《敦煌研究》2018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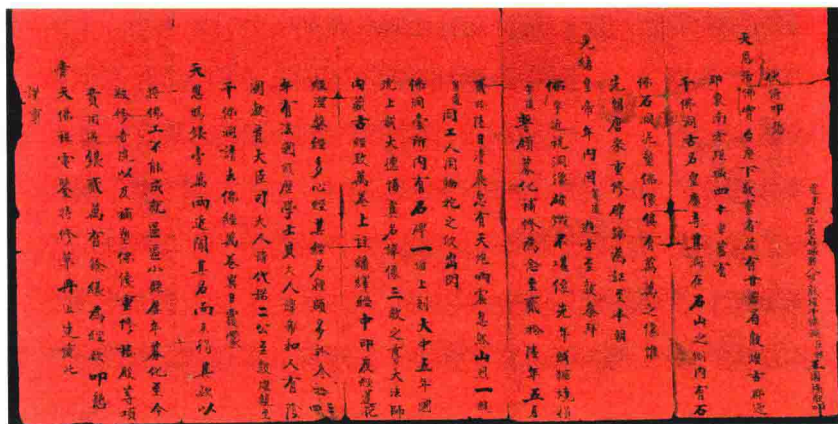
至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复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

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册上达，肃此  
谨禀

《草册》对藏经洞的发现时间说得十分具体，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与庚子孟夏之说吻合。而且还提到法国贝希和、阴国（即英国）司代诺（即伯希和、斯坦因）二人“请”去佛经万卷之事，故此件应写于1908年之后不久，应当说是可信的。

此外，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都说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他们二人必亲闻之于王道士，所以与庚子发现说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即王园禄做了道士，来到敦煌后，生活无着，投宿于莫高窟。此时的千佛洞寺院，僧人多为藏传佛教喇嘛，诵的也非汉传经文，唯独王园禄能诵道经，说中原话，所以人们大都求他礼忏。其生活因此渐渐好了起来，于是就雇一杨某写经。杨某在



《催募经款草册》

第16窟甬道中置一桌案，经常在此伏案写经。抄经休息时，常以茭草点旱烟吸之，也经常把燃余之草插在墙壁裂缝中。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杨某又在此伏案写经，这次他与往常一样，吸完烟后就把燃剩的茭草插在背后墙壁裂缝中。奇怪的是这次却草插而不可止，用手击之，发现内中是空的，因而甚感惊异。杨某把此事报告了王道士，王道士即与杨某合力破其壁，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人，用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则为一小甬道，入内为一复洞，由此发现了藏经洞。此说没有旁证，也近于传奇，聊备一说，仅供参考。

## 二、土地庙文书发现记

敦煌遗书，主要是指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大批遗书而言。除此之外，还应包括1944年土地庙残塑中发现的少量文书。

1944年7月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建职工宿舍，准备拆除



中寺后院中的土地庙，先将庙内土地、山神、牛王、马王、药王等五尊残塑像搬出，放置在土地庙外西墙根下。8月30日上午11时许，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警长）窦占彪打破其中三尊残塑，发现残塑体内中心支柱上缠裹着一些经卷，当即由警长窦占彪和泥工秦志和等将这些经卷持送到所长常书鸿的办公室。常书鸿让研究人员苏莹辉、刘荣曾共同检视包封。下午4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常书鸿、董希文、李浴、张琳英、陈芝秀、邵芳、苏莹辉、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等留所全体人员，在考古组启封检点，“并敦请中研院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夏作铭（鼐）、向觉明（达）、阎述祖（文儒）三先生莅场监视，以昭郑重”<sup>①</sup>，由苏莹辉、李浴、刘荣曾记录登记。

关于土地庙文书的发现，最早、最基本的记录是当时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之报告：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发现藏经  
初步检验报告

本所因修建职员宿舍，于八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在后园土地祠（该庙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残塑中发现六朝残经多卷，当经鸿召集全体职员并邀请现正在千佛洞工作之西北考察团考古组向达、夏鼐、阎文儒三先生参加检验，详细记录。计共得六朝残经

<sup>①</sup> 苏莹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北魏写经颇多未记》，载《西北日报》1944年12月1日。



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其中有题记年号者，计北魏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写佛说灌顶章句拔除罪过生死得度经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丰国写孝经残页三种。此外尚有六朝职官名册残页，均甚名贵，现经匆促编造初次查验目录。该项残页现妥存本所，此次发现，实为史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闻，本所成立于盗窃俱空之际，有此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之“敦煌学”又增加若干研究资料，亦中国文化之幸也。

常书鸿谨志于莫高窟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

参加检验本所职员：

常书鸿 张琳英 刘荣曾 李 浴

陈延儒 苏莹辉 邵 芳 陈芝秀

董希文 辛普德

监验人：向 达 夏 鼐 阎文儒

纪 录：苏莹辉 李 浴 刘荣曾<sup>①</sup>

另外，著名敦煌学家、当时作为监验人之一的向达先生，在同年就发表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sup>②</sup>一文，对此也有简单记述：“难为王道士当时除隐匿不少外，并将经卷任意置于

<sup>①</sup> 该报告见苏莹辉：《敦煌学概要》（修订再版），台湾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1981年10月版。

<sup>②</sup> 原载《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12月出版）。又见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